

赵稀方 著

翻译与 现代中国

Translation and
Modern China

非外借

翻译与现代中国

赵稀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现代中国/赵稀方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7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3240-3

I. 翻… II. 赵… III. 翻译学-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569 号

翻译与现代中国

赵稀方 著

责任编辑/宋启立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5 字数 253 千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240-3/H · 2759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21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159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的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第二辑说明

如上所说,“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所以这次我们又推出了第二辑。这一辑我们收入了三本论文集,分别是谭载喜的《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赵稀方的《翻译与现代中国》和刘和平的《翻译学:口译理论与口译教育》。三本论文集各具特色:近三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谭载喜教授把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汇编成一集,供读者全面了解他探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国文学研究出身、主治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赵稀方在他的论文集里,不仅考察了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还上溯探源,对晚清五四期间中国翻译的流脉进行了清理;而巴黎高翻口译博士出身的刘和平,其研究目光自然是集中在口译的理论与教学领域。在翻译研究领域,口译研究是最不易触碰的一块研究领域,而刘教授历年来发表出版的有关口译研究的论著则给翻译界的同仁诸多启迪。我们希望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论文集能对当前国内方兴未艾的翻译研究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这三本论文集能得到国内外翻译界和翻译教学界相关研究人员和广大师生的喜爱。

谢天振 王 宁

2017年8月于上海

自序

在中国,翻译文学研究一向被看作是外文系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并非“古已有之”。阿英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的时候,便收入了翻译的部分。当时的新文学史,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也都有翻译文学研究专章。1949年后,翻译文学变成了外国文学,于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就脱离了关系。

进入新时期以后,研究者对于这种状况不断提出质疑。谢天振先生明确提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王宏志先生也以外国“翻译研究”理论为参照,提出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的观点。的确,从语言上看,翻译文学是一种中文文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翻译其实与被翻译的国家没什么关系,它的生产机制及其影响都产生于中文世界,当然应该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观念有所转变,中文系的学者也开始研究翻译文学,不过外文系与中文系的翻译研究一向不搭界。2016年10月,我召集了一次有关翻译的学术研讨会,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学者各占半壁江山。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既然双方目标一致,何不取长补短、共同探讨呢?从效果看,应该说还不错。当时正在撰写此书,于是将研讨会的题目命名为“翻译与现代中国”。

我最初接触翻译研究,始于后殖民理论研究。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到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特贾斯维莉·尼南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等有关语言与帝国及文化身份的研究

究,翻译研究一直是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镇,这引起了我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兴趣。

我的第一本翻译研究的书,是2003年出版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这本书讨论的是文学,然而侧重于思想史,希望将翻译作为切入口,考察新时期以来中西话语实践冲突的过程。其后,我应邀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的佛山会议,开始进入外文系的翻译研究界,这才发现我的书在外文系有不少读者,还进入了课堂,这是我意想不到的,对我也是一个鼓舞。

2009年,在《后殖民理论》和《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两本书出版后,我决定往上溯源,探讨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翻译的流脉,结果是2012年出版的《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这本书结稿的时候,我正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讲学,正在台湾的王德威先生认真地审读了书稿,认为“无论史料征引或理论辩难均有突破”,欣然推荐出版。可惜的是,此书的反应仍在外文学界,首先评论此书的是《中国翻译》,其次是《中国比较文学》。

今年在我的博士生的答辩会上,有学者说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有点说穿了我的心思。他看到,我近年来的博士生都在填补翻译文学史不同的点。今年王建丰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上海沦陷区的文学翻译》,正好接着去年郭刚的博士论文《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翻译》。俩男生都很下工夫,把相应时段上海的报刊翻译情况全部摸索了一遍。往前看,高云球做伪满洲国的翻译研究,赵社娜做海明威在中国的翻译,张琳做辛克莱在中国的翻译,往后数,侯杰正在做《东方杂志》的翻译研究,徐婷做同文馆的翻译研究,马晓梅正在做《妇女杂志》的研究。自然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把翻译文学史的主要部分清理一遍。这一想法是很渺茫的,它注定要成为“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本书题为“翻译与现代中国”,以1949年为界分为上下编,旨在考察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篇幅所限,只能选取一些“点”,画出一个轮廓。既粗略展示翻译史的线索,也试

图通过不同写法表现翻译研究的张力。鸟儿已经飞过,天空中大概不会留下痕迹。

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谢天振先生的推荐出版。谢老师是国内翻译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有时候因为超前而不被人理解。我其实更喜欢的是谢老师的为人,他的心态既年轻又平和,从善如流,不知道是怎么修炼出来的。

有时候,早晨醒来看到满地的积雪,或者从书桌上抬头面对正午的阳光,我常常会有老之将至的感觉,刹那间心灰意懒。谢老师已经年过七十,却一直生机勃勃。我和他联系的时候,他常常在路上,交流学术或享受生活。“在路上”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 录

上 编

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

——明清“译名之争” 3

天演与公理

——《天演论》与《民约论》 34

文化的碰撞与协商

——《毒蛇圈》的翻译 70

现代翻译的形成

——《新青年》的翻译 93

另类现代性的建构

——《学衡》的翻译 155

下 编

翻译的当代转型

——从延安整风到知识分子改造 171

现代主义的海外接续	
——香港《文艺新潮》的翻译	184
新时期的思想复苏	
——“名著重印与人道主义”	205
性别的误区	
——女性主义的翻译构建	225
俄苏文学的光明梦	
——俄苏文学的翻译	244
中国翻译研究落后多少年？	
——《红与黑》翻译论争的启示	274
别是一家	(何夕)
——赵稀方的学问之道	302

上 编

- 从政治实践到话语实践
- 天演与公理
- 文化的碰撞与协商
- 现代翻译的形成
- 另类现代性的建构